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1)06-0019-05

学术研究与学科地位

——对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发展史的案例分析

雷 洪 德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学术研究存在学科地位问题, 主要表现为学科地位的有无和高低。对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的案例分析显示: 学科地位的获得和提升是一个基于学术研究的优势累积过程, 需要经历学科生成、学科成长、学科趋于成熟等阶段。为了获得和提升学科地位, 学术研究需要实现专业化并取得社会认同。

关键词: 学术研究; 学科地位; 专业化; 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一、学术研究存在学科地位问题

学术研究本无所谓地位问题, 但与社会一结合就有了地位问题。社会总是分层的, 不同层次社会成员的地位是不同的。社会又是分领域的, 并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领域, 这些领域对学术研究的需求程度和供给力度的差异, 使得学术研究事实上存在着地位差异, 并突出表现在学科地位上。在高等教育领域, 学科有两种基本意义: 一是高深学问的分支, 一是大学教学的科目。无论是哪种意义, 学科地位都是学术研究的产物。没有学术研究, 不可能有学科地位。但是, 有了学术研究, 并不意味着就有学科地位。

首先, 并不是每种学术研究都能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即使某种学术研究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也不一定能够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例如, 高等教育研究在美国已达较高水平, 但至今还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高等教育研究

在中国则不然, 即使在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的 1983 年, 就“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获得了行政上的合法化”^[1],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由此可见, 学术研究之于学科地位, 是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 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除了学术研究, 还需要其它一些条件。

其次, 某种学术研究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只是解决了学科地位的有无问题, 还存在着学科地位的高低问题。就学科体系而言, 学科是分类的, 不同门类的学科所具有的地位是不同的。例如, 我国 2011 年 3 月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和艺术学 13 个学科门类。这些不同门类的学科, 在理论上无所谓地位高低, 在实践中却具有不同的地位, 并突出地表现为学术声誉、资源获取、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即使是在同一个学科门类, 不同的二级或三级学科所具有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中国大学的学科建制中, 存在着校级、省部级、国家级等学科等级, 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是一个学科可获得的最高地位。

收稿日期: 2011-08-07

作者简介: 雷洪德(1972—), 男, 湖北洪湖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1 年度教育部青年基金课题“扩招以来我国高校专业调整的政策分析”(EIA110377)的部分成果之一。

上述现象引发了学者和办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学术研究如何获得和提升学科地位”。对于经常受到学科地位之争困扰的高等教育研究,这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鉴于此,本文以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为案例,对其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的过程进行科学社会学分析,以期从微观上对上述问题做出尝试性回答。

二、学科地位获得和提升的过程:

一个国家重点学科的诞生(1980—2007年)

以1980年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为标志,原华中工学院(先在1988年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后在2000年与其它3所高校合并组建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校更名前后的校名拼音首字母都是H,本文以“H大学”简称之)开始了组织化的高等教育研究。

1. 学科生成阶段(1980—1986年):建成二级学科硕士点

H大学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室的初始目标,是为学校改革提供咨询服务和决策参考。当时,该大学正在朱九思先生的带领下实行改革,努力突破前苏联的办学模式,力争把学校由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学转变成为一所学科综合化的大学,并把学校由一个中心(教学)转变为两个中心(教学和科研)。变革中的学校,给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发展机会。H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成立之后,研究的第一个课题“高等学校学科结构的综合化和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就是直接源于H大学的发展需求,其研究成果在H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设置为独立的二级学科。1984年,厦门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这两个外部事件推动了H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转型和功能扩展,促使其由一个规模很小的研究机构转型为规模较大、功能更多的教学研究机构。1985年,H大学将高等教育研究室扩建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在校内新聘了多名专职研究人员,并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请设置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986年,通过审批成为全国工科院校设置的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2. 学科成长阶段(1987—1996年):建成二级学科博士点

成为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之后,H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化水平稳步提高,组织建设发生了三点

重要变化。一是组织规模扩大,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由不足10人增至20多人。二是组织功能扩展,由主要针对本校问题的中观院校研究和微观教学研究,扩展至面向全国和世界的宏观高等教育研究;由单纯从事科研,扩展至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三是组织机构细化,设置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室、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室、大学教学研究室、德育研究室等分支机构。四是组织领导专职化,不再由别的机构领导兼任。以上变化有力地促进了H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建设和学科成长。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之后,曾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一次“寒冬”。在此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大学所设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销声匿迹。而H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没有中断,走上了优势累积的持续发展道路。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H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资格,成为全国第四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

3. 学科趋于成熟阶段(1997—2007年):建成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宣勇等学者对全国113个国家重点学科的调查研究显示,成熟期的学科具有以下8个共性特征:(1)研究领域、方向和水平的不可替代性;(2)标志性的研究成果;(3)可持续的知识产出;(4)稳定的资源获取;(5)明晰的组织结构;(6)规范的学科制度;(7)良好的学科传统;(8)较高的国际化程度^[2]。以这些特征为衡量标准,到2007年,H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总体上已经趋于成熟,在第(1)、(2)、(3)、(5)、(7)等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就第(1)方面而言,在院校研究、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大学教育思想等领域和方向达到了较高水平,在国内具有不可替代性。就第(2)方面而言,承担和完成了一系列科研项目,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科研成果。例如,刘献君教授主持的“理工科大学结合专业课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获得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就第(3)方面而言,知识产出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自2005年起,在《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14个高等教育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一直位居全国高校榜首。就第(5)方面而言,在2000年扩建为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始拓展学科宽度。到2007年,已经建立起主干突出、支撑比较有力的多学科结构,并且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学科组织。就第(7)方面而言,重视理论联系实践的

专题研究,不搞“问题偏大、理论偏多、资料偏虚、方法偏乱”的研究^[3],已经成为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传统。

总体而言,在 1996 年成为博士点之后,高等教育研究在 H 大学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正是基于以上进展所打造的实力,H 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在 2007 年进入了国家重点学科行列,成为该学科第二个国家重点学科。

三、学科地位获得和提升的内部条件： 学术研究的专业化

从内部条件来看,H 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登上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序列的顶峰,主要是因为其实现了专业化。

1. 建立专业组织

组织建设之于学科发展,就好比根据地建设之于革命胜利。科学社会学家 Joseph Ben-David 的研究显示,有两种类型的条件可以解释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科学活动之间的差异:一种是公民价值观和兴趣的改变;另一种是科学工作的组织,“在 1840 年前后,科学组织开始变成了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4]。科学计量学家 Bluma C. Peritz 的研究则显示:“任何一门渴望得到学术界承认的新生学科,都必须或迟早地建立起本学科的学术教学基地,没有教学、没有研究生,没有师生之间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和切磋,任何新生学科都是注定要失败的。”^[5]他们的研究共同显示,组织建设在学科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新生学科,在 H 大学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展为国家重点学科,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获得了制度化的组织保障。在学科生成阶段,建立了专门从事研究的高等教育研究室;在学科成长阶段,建立了研究与教学合一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学科趋于成熟阶段,建立了功能更加齐全、学科覆盖面更广的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学科实现重点突破阶段,不仅建立了专门开展院校研究的院校发展研究中心,而且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的成立。没有这些制度化的组织保障,H 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就无法摆脱零散的状态,难以成为一种稳定的学术职业,更难以获得如今的学科地位。

2. 汇聚专业人员

专业性是学科的基本特性,专业人员是学科发

展的第一资源。这里所说的“专业”有三种层次:第一层指的是专门从事一种职业,不是时而从事这种职业,时而从事那种职业,更不是同时从事几种职业;第二层指的是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专门知识,能够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第三层指的是专心致志,以学术研究为生存方式。这三种层次的专业都很重要,而且层层深入。没有第一种层次的专业,就无法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没有第二种层次的专业,就无法保证学术研究的质量。没有第三种层次的专业,则无法保证学术研究深入持久的发展。到 2007 年,H 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专任教师中有 18 人专职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1 人;博士学位获得者 15 人,在读博士生 1 人。这些专业人员的职称和学历层次高,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也高,形成了一个具有积聚效应的研究型组织。他们在专职岗位上,以专业的知识和专注的精神,推动着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发展。

3. 取得专业成果

学科是一种文化场域,一种研究要想进入这个场域,需要以专业成果为门票;要想扎根这个场域,则要取得数量多、质量高的专业成果。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取得的专业成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质量较高,为其入场提供了门票,为其站稳脚跟和提升地位提供了文化资本和实力支撑。有学者运用 h 指数方法,对中国大陆地区 15 个高等教育专业期刊 1998—2007 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评选出这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47 位学者,其中 7 位来自 H 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总数名列全国第一^[6]。科学社会学的大量实证研究显示,业绩差异是造成学术系统分化的关键性变量,而反映业绩最为关键的指标是学术发表的数量与引用率^[7]。H 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在这个指标上表现优异,是其获得和提升学科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H 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关注和深入实践的传统,取得的一些专业成果对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杨叔子、涂又光、文辅相、刘献君等教授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原创性理论研究,不仅为 H 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深刻影响和促进了全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8]。

4. 创办专业期刊

创办专业期刊是实现学科研究制度化的重要步骤,对于学科地位的获得和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可

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从“文革”废墟和思想禁锢中走出的中国大学领导,较少意识到创办专业期刊的重要性,即使意识到也怕惹麻烦。时任 H 大学校长的朱九思先生则不然,他认为:“学术刊物是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形式,通过办刊物可以团结一大批国内外的学者。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办学术刊物,可以促进学术交流、了解学科的发展前沿,快速提高我校教师的科研水平。”^[9]在他直接领导下,H 大学申请创办了一批专业期刊,其中包括 1980 年创办的《高等教育研究》和 1983 年创办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前者是全国创刊最早、公开发行的最早的高等教育专业期刊,后者是作为教育部部属高等工业学校教育研究协作组会刊而创办的。这两个具有先发优势、高端切入的学术期刊,为 H 大学建立高等教育交流网络、汇聚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进高等教育实践探索、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学科地位获得和提升的外部条件： 学术研究的社会认同

从外部条件来看,H 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得较高的学科地位,源于它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并突出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 学科制度认同

学术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虽然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需要制度化,但是“需要从外部机构获得有组织的支持,并且吸收或利用外部机构的活动成果。……一种智力活动只有实现基本的制度化,才可能富有成效地开展”^[10]。Edward Shils 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并论述的以上观点,得到了科学社会学之父 Robert King Merton 的高度赞扬。他们对智力活动制度化的共同强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学科制度认同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一种学术研究要想实现基本的制度化,就必须获得学科制度认同,而最基本的学科制度认同就是学科准入。中国的学科准入是由国家主导的,一种学术研究要想获得学科地位,必须进入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也就是说,必须进入体制内,获得国家认可的合法“户口”^[11]。198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将高等教育学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为高等教育研究打开了学科准入之门。这是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获得学科地位的基本制度前提。有了这个

前提,高等教育研究在 H 大学就有了学科地位获得的合法依据,一旦获得了学科地位,就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和制度性存在,在内具有维护自身存在、抵制干扰的功能,对外具有争取资助和奖励的资格。

2. 社会发展需求

从需求角度来看,学科地位的获得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需求方的社会地位,二是需求方的需求程度。需求方的社会地位越高,以此需求方为对象的研究就越有可能获得高学科地位。例如,1978 年以来,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的中心工作,以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迅速成为显学。需求方对某种研究的需求程度越高,这种研究就越有可能获得高学科地位。例如,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对社会学形成了旺盛的需求,显著地提高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就高等教育学而言,其兴起的时代:“正是高等教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新现象层出不穷的系统的时代,它已经成为一种极度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不断彰显,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12]由此来看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获得的较高学科地位,既受益于高等教育所具有的较高社会地位,也受益于日益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研究的需求程度越来越高。而且,H 大学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实现了一些战略转变。例如,从只有工科转变到学科综合化,从只有教学转变到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从只有专业教育、科学教育转变到将素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紧密结合^[13]。这些战略转变对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旺盛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地位提升。

3. 权威人士支持

学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也有重大差别。政治贵在民主,学术贵在自由。因为自由,而有了多样的选择。在多样选择中,选择谁,不选择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威人士,尤其取决于领导人物。他们对于某种学术研究的选择偏好,极大地影响着这种学术研究的学科地位、发展方向与发展水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学校的某个学科发展,往往与大学领导层成员的办学思想和偏好有关,受到领导层重视的学科往往发展较好。”^[14]朱九思、姚启和、杨叔子、刘献君、冯向东等教授,都曾担任过 H 大学的领导,他们不仅高度重视而且亲自参与高等教育研究,是 H 大学

建成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领导力量。蔡克勇先生原是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85 年调到原国家教委担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更高、更广的平台上支持着 H 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涂又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1993 年被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返聘为教授之后,长期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史、教育哲学等领域根本问题的研究,为夯实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根基做出了重要贡献。潘懋元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直非常支持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建设,不仅多次来校讲学和授课,而且给 H 大学输送了多名自己指导的优秀博士毕业生,这些博士现在都已成为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骨干力量。2000 年以来,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在原教育部部长周济院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教授等权威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将院校研究作为研究重点,大力推进院校研究的中国化,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的院校研

究,成功地实现了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突破。

五、结 论

本文以 H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为例,从历史分析与条件分析两个方面,对“学术研究如何获得和提升学科地位”问题做了尝试性回答,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学术研究存在学科地位问题,突出表现为学科地位的有无与高低。学术研究是学科地位获得和提升的必要条件,但是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线性关系。第二,学科地位的获得和提升是一个基于学术研究的优势累积过程,需要经历学科生成、学科成长、学科趋于成熟等阶段。第三,学科地位的获得是内外条件结合的产物。就内部条件而言,学术研究需要实现专业化。就外部条件而言,学科研究需要获得社会认同。只有内外部条件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才可能合理、合法地获得和提升学科地位。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 高等教育学:在学科与领域之间[J]. 高等教育研究,2009,(11):46.
- [2] 宣勇. 大学学科组织成熟期及其表征——基于国家重点学科的调查[J]. 教育发展研究,2008,(1):30-34.
- [3] 刘献君. 努力将中国院校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J]. 高等教育研究,2007,(9):25-28.
- [4] 约瑟夫·本-戴维.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 赵佳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331-332.
- [5] Peritz B C. Little Scientometrics, Big Scientometrics and Beyond, Scientometrics[J], 1994,(2):417.
- [6] 魏顺平,等.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评价[J]. 高等教育研究,2008,(12):50-59.
- [7] 阎光才. 学术系统的分化结构与学术精英的生成机制[J]. 高等教育研究,2010,(3):3.
- [8] 张应强. 科学规划 敢于创新 建设特色鲜明的教育学科[J]. 高等教育研究,2010,(9):4.
- [9] 朱九思. 开拓与改革[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85.
- [10] Shils E. Tradition, Ecology, and I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J]. Daedalus, 1970,(4):763.
- [11] 万力维. 控制与分等:大学学科制度的权力逻辑[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5.
- [12] 张应强,等. 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定位[J]. 教育研究,2010,(1):42.
- [13] 杨叔子. 继承历史财富 不断丰富发展——由庆祝朱九思同志九十华诞而作[J]. 高等教育研究,2006,(3):6-7.
- [14] 庞青山. 大学学科论[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188.

Academic Research and Status of a Disciplinary Program —A Cas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a National Key Disciplinary Program

LEI Hong-d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Academic research is faced with an issue of the status of a disciplinary program.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national key program. A case study on its history shows that the attainment and enhancement of its status is a process of strength accumulation based 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process involves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inception, growth and maturation. To acquire and raise its status, a disciplinary program must achieve specialization and general recognition of its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academic research; status of a disciplinary program; specialization; general recognition